

文化遗产事业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 旗

5月14日的夜，是一个不眠之夜。

10点多的时候，还在和一位协助照料罗哲文先生住院就医事宜的同志沟通老先生第二天要调换病房的事情，忧虑老人家的病情。没想到，11点多，就接到罗老家里的电话，家属被全部召喚到医院。

心顿时揪起来了。很快，噩耗传来，人没了，老人家走了。

尽管早有不祥的预感，但突如其来的事变还是让我难以承受。半夜了，我把信息逐一发给关心着罗老的亲友和晚辈们。辗转不能入睡，泪浸衣襟。

1976年，大灾之年。7·28唐山大地震之后，还在余震不息的日子里，刚刚结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业，我就来到了罗老身边。那时，我被分配到了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实际工作是担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直接运作的“地震考古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上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文物处处长陈滋德，罗老是顾问。那时，老同志们都称罗老为“小罗”。我们这些晚辈，几乎没称呼他几天“老罗”，便都恭恭敬敬地尊称“罗公”，并且此后一直作为最亲近的称谓。自那以后，没有离开过他的言传身教。

关于罗公的最初印象，是和善和专业。不多言不多语，就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厚道和善心。而且，除了对人的善良，他的眼里、

心里好像都是他手头的工作，兴趣都在观察和收集资料，心思都在专业分析和归纳。总在拍照，记录、琢磨。出口三言两语，就给人启发，引人思考。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大地震之后，通过对古建筑位移、损坏情况的调查和统计，对古籍文献相关资料的查找和研究，以及对照现代技术条件下对地震震级和烈度的测定和现场惨状，推断、分析历史地震的相关参数和危害程度，从而为研究首都周边的地震规律和现象、推进地震预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使文物考古为当代国计民生和科技进步做出独到的贡献。为此，我们跟随罗公跑遍了京、津、唐地震现场，也查遍了大江南北的古籍书库。

一进到文博队伍，就听到一个又一个关于罗公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揭发、打倒当权派”呈疾风暴雨之势，在那时谁不如此就会面临政治危机及自身的年月，罗公和文物局极少数几个人便是坚持说老局长王冶秋同志是好人，并且敢为之作证、辩论。那时，罗公自己的母亲还正因为解放前为地下党掩护过两支手枪而被诬为“土匪双枪老太婆”呢！罗公痴迷业务。1976年夏季，依然是黑云压城欲摧的时候，天天和他在一起，却没听他提起过身边的政治运动。他的言谈之中，总是一座古建筑的历史、意义、价值如何地“了不起”，以及如何说当地主管者加以保护。再就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讲不完的古迹、趣事、名人。当然，也有辛酸。

罗老与古建人才培养

汤羽扬

我多年在高校从事建筑历史的教学，对罗哲文先生早已熟悉。而真正与罗先生的接触，是在1993年开始的三峡工程淹没区地面文物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罗先生不离身的照相机，以及对古建筑由衷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罗先生不仅在长城以及大运河的保护中付出过大量心血，在培育古建筑保护人才方面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1993年、

1994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举办的古建班大专班曾得到了罗先生的支持帮助。罗先生不仅为我们举办讲座、参加学生毕业答辩，之后更多次参加研究生的毕业答辩。罗先生的支持为学校形成古建筑保护特色起到重要的作用。

罗先生虽然走了，但是老先生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奉献精神将会代代传承下去。我与我的学生们永远怀念罗哲文先生！

一马当先的古建专家

张 松

5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城市建筑文化论坛”上见到了新华社记者王军先生，话题自然离不开当过历史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而让我吃惊不小的还是他还告诉我一个巨大的不幸消息：罗哲文先生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在论坛开始时，我在微博上把这条无法令人相信的噩耗发了出去并加蜡烛以表哀悼。论坛上第一位演讲嘉宾是著名文化学者钱文忠先生，他对这些年以牺牲环境、消耗资源和破坏文化为代价的大发展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他还指出目前对中国古建筑及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严重不足，整体水准还停留在营造学社时期梁思成、林徽因等的研究成果上。这时，让我再一次想起了罗老，这位古建筑专家、营造学社最后一位成员的离去，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还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由于年龄、资历的关系，我与罗哲文先生的距离本来是很大的，但由于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研究工作，与罗老接触的机会便多了起来。记得是在1998年，我参与阮仪三教授主持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专程到北京向罗老、郑(孝燮)老等前辈讨教，并在北京召开的课题论证会上聆听他及其他各位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的见解对课题完善以及加深我对中国名城保护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帮助。此后，我与罗老有了较多的接触。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去现场考察或者进行方案评审的时候，我见到的这位年龄长我许多的老前辈总是精神饱满、活力四射。那一年，在评审由我们完成的“福建土楼保护规划”时，要去现

场踏勘，当地的负责人鉴于他年事已高，又来过土楼多次，就建议他不去现场了，结果罗老不仅坚持要去而且许多时候还一马当先跑在前头，在山上，在村落，手中的相机不停地拍摄记录，一丝不苟、兴致盎然。

我所见到的罗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平头百姓，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青年学生，他都是一样热情地对待。为同行专著写序，为后学书籍题写书名，有时候一大篇的序言竟是用毛笔工整书写下来的，优美的书法反映了老先生的功底，工整的布局折射出大专家的品德。自然，在他投入毕生精力关注的古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事业上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在哪里，无论出于何种状况，他总是积极鼓励、热情支持各地开展遗产保护工作，对出现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也会提出严厉的批评，把危害和不当说得非常明白非常透彻，而且多数时候其神情依然是热情和友好的。如果碰到情形严重和无法说服地方领导的时候，还会主动提议或是积极参加到专家签名呼吁的行动中来。

4月初，进京参加第四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家评审活动，本来应该会见到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罗哲文先生，会上获悉罗老因身体不适无法与会，一时大家都担心询问起来，在得知是小感冒后才放下心来。我也在想，4月中旬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纪念日，5月中旬有国家博物馆日，6月有文化遗产日，而且今年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创设30年，一定会在哪里与这位大专家再见面的。没想到，这一次罗老突然永远地离开了……

老一辈都戏称“小罗”是个“迷糊”。他的心思总不在生活琐事，更不在官场和人际关系上。是20多岁时，测塔塔时退至边缘从半空摔下，亏得落在柴禾堆上，捡回一条命，但从那时留下了腰疾。以后又多次因拍照而高空遇险，所幸未酿成重大事故。有趣的是，罗公每年都至少丢一顶帽子，眼镜也丢得不计其数。有一次在宁波考察，汽车开出几十里地了，老人家忽然发觉，刚才拍照换镜头时，换下的镜头放在佛爷身后忘了拿了……

可是，无论何时，谁要是想找什么已无处查询的文物资料，只要找到罗公，在那外人看来因为挤满书籍几无立足之地的房间和文献堆中，用不了多长时间，他马上就会给你找出相应的文字资料，还有珍贵的图片。日期、地点、细节，一清二楚。

罗公和谢老谢辰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投身文化遗产事业，并参与新中国文博事业至今为止全过程的仅有的两位功勋卓著的领军人和见证人。

我看到过罗公怀抱自己创作的图案和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旗设计的各位大师的合影。

新中国的文物法规、业务规则，无一没有罗公的参与。重大的文物古建筑维修工程，都有罗公的身影。长城、十三陵、布达拉宫、天安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の設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工作的创设，乃至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相

关工作，都有罗公的声音回响。

罗公还特别前瞻，特别开放，与时俱进，具有国际视野。他是“文革”之后放眼看世界，广泛、深入、实际地开展国际交流的先驱。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签署《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就源于罗公和其他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议书。

中国同行参加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非政府文化遗产研究、评估、咨询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也得益于罗公的促进。这对中国的文物工作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任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曾酝酿请罗公出任，因故未果。罗公毫不介意，在他心里，该办的好事做成就行了。

以国家名义参加当今世界唯一的政府间国际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培训机构——设在罗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保存研究中心，罗公也是最初的参与者。我还记得罗公在罗马斗兽场被抢劫的惊险事件。所幸除了财产损失，人身未受伤害。那时，远赴意大利韩旋中国人会事宜的罗公已是七旬高龄。

大家都知道，罗公有一幅慈悲心肠。文物保护的事，没有他不鼓励的；想做文物研究和保护的人，没有他不同情、不举荐、不扶持的。我们甚至常说罗公心肠太软，太好说话了。一些我们认为一时还不该同意的文物评议项目，或不该满足的一些个人要求，只要求到他，他都会热心支持。



内蒙古长城大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包括战国长城、秦代长城、汉代长城、金界壕、明长城和北魏长城。这些长城遗迹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风沙、雨雪、地震的侵蚀，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地段的长城损毁或成为危墙。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组织20个长城调查队，全面完成了长城资源调查，确认内蒙古明长城总长度为712.6公里，其他时期长城长约6600公里，长城合计长度位居全国首位。内蒙古近年来实施了秦汉金明时期长城的保护工程，在东起呼伦贝尔、西至阿拉善长达数千公里的长城沿线，竖立了2000余块长城保护标志。在重点地区组建了长城保护队，聘请长城保护员。图为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县境内的金界壕遗迹。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在其北部边境兴建界壕与边堡，统称金建壕，又称金长城(5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赵婷婷 摄

罗哲文先生突然离我们而去，我的心情十分沉痛，这几天除了撰写唁电，去罗老家探望之外，脑海里都是空白，只有罗老身背两个相机、风尘仆仆走在文化遗产考察途中的形象。作为晚辈，我最初认识罗老是在1982年。我的导师侯仁之先生与罗老是故交，经常听侯先生谈起罗老，他们一块出席有关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会议，我也有幸认识了罗老。1984年我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从事名城保护工作，与罗老有较多的工作接触，特别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成立后，罗老是副主任委员，我则在秘书处做一些组织会议和日常联系的工作，与罗老的联系就更多了一些。以下片断的回忆表达我对罗老深深怀念之情。

建议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四位功勋之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这一公约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和加入，用了13年的时间。1984年，侯仁之先生在美国讲学访问，了解到这个公约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他回国后便与罗哲文先生、郑孝燮先生面谈此事，侯先生自己还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1985年4月的政协会议上，侯先生写了《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罗哲文先生和郑孝燮先生都是在提案上签名，由于公约包括“文化和自然遗产”两个方面，因此，中

但我们都理解他。在他心里，文物是保得越多越好；“文革”浩劫中“文物保护单位”这个身份证多多少少起到了护身符作用，这一经历让他对设立和颁授各种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和称号相对比较宽松，为的是能更加引起公众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和爱护。他对人不讲门派，不计恩怨，只希望热心文化遗产事业的人越多越好。尤其对中青年，兴趣或早或晚，相识或亲或疏，只要是有志、有意于研究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他都帮忙说话，他的内心挚诚地期待遗产队伍尽快壮大，遗产保护知识普及于社会，走进普通人的心中。

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在罗公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可以放肆地发表不同意见。他老人家总是憨憨地笑着，耐心地听，偶或和我们辩论几句。涉及对人的态度，他总是向我们提示所设对象的长处和对事业积极的一面；涉及专业观点，他老人家也很固执，但从不以势压人。我们在争论中有不同意见，他从不以为忤。有人提起时，他还开心地笑眯眯地说：“哈哈，我们有学术观点分歧，是好事啊！”而我们都懂得，他的观点全都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尊崇和热爱。

罗公是历史传奇“营造学社”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我们说，罗公，您回营造学社了。一路走好，去会聚您的师长、先贤、老友。今后的岁月里和征程中，我们会永远思念着罗公。

成都挂牌保护27处历史建筑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日前从成都市房管局了解到，成都在最大旧城改造工程“北改工程”中，通过实地踏勘、现场甄别，初步筛选出薛公馆、张大千故居、旃檀寺等27处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房管部门将组织实施挂牌保护。

成都市房管局负责人介绍，“北改工程”是成都近年来最大的旧城改造工程，涉及成都城北3个区195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建筑物。从今年1月开始，成都市房管局在前一阶段全市历史建筑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各区（市）县房管局和有关专家，对“北改工程”片区的历史建筑进

行了重点复查。

目前，复查工作已全面完成，初步筛选了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27处。此前，这些历史建筑均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年代以近现代为主，建筑风格多为苏式建筑和川西民居，风格独特，保存基本完好，是当地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印记。

近来，不断有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拆毁历史建筑，引发社会关注和争议。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委、市政府已将历史建筑保护纳入民生工程目标管理，进行重点部署，力求处理好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的关系。（陈 健）

广西柳州工业博物馆揭牌

据新华社消息

1933年研发的广西第一台汽车“木炭车”、1937年柳州制造的广西第一架单座驱逐战斗机、柳州工程机械厂生产的中国第一代Z435型轮式装载机……5月19日，广西柳州工业博物馆揭牌开馆，这一独具特色的综合性工业博物馆，通过6000多件工业遗存，向人们展示着西南工业重镇柳州的百年工业史。

当天，由国家文物局、广西壮族自冶区文化厅，柳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柳州工业博物馆揭牌仪式结束后，展馆正式对外开放。

柳州市委书记陈刚介绍，占地近11万平方米的工业博物馆，集工业历史展示、工业遗产保护、科学知识普及、旅游休闲于一体，展馆由原柳州市第三棉纺织厂的老厂房改建而成，是柳州市投资建设的首家工业博物馆。馆内珍藏了反映柳州百年工业历史发展的各类大小工业遗存实物6226件，各种文献资料、图片11645件，火车头、汽车、拖拉机、装载机、机床、搪瓷杯、老饭票等，不一而足。展品展示了自1902年以来柳州工业发展壮大的历史。（李 斌）

让遗产保护深入人心的人

张 杰

今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30周年，为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始梳理我国在该领域的法规、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清华团队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我本想稿成之后请罗老予以指正，为书名题字。没想到老人溘然长逝，万分悲痛。

罗老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罗老特别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中的作用，经常提醒我们，一些地方在历史上有过突出的地位，虽然现在留下的历史建筑不多了，但仍要积极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特色日益成为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支柱所在，回想罗老的教诲，倍感先生高瞻远瞩，洞察力过人。

罗老在中国古建筑尤其是长城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赫，名扬四海。前几年罗老去湖南凤凰考

察，在看到苗防边墙后，欣喜不已，认为这印证了他多年前曾在文献上看到的南方也有长城的记载，并希望地方考古部门尽快进行调查。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苗防边墙是凤凰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遗产内容，更是我国北方长城之外现存的最重要的区域性防御体系之一。

我自1990年初回国后，因工作原因有幸结识罗老已近20年，在专业和工作上得到罗老很多指导和帮助。罗老为人平和，没有架子，为人们所爱戴。获悉罗老去世的消息，回家跟我爱人提起，上初二的女儿听到了，急忙问：“罗哲文去世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罗先生的名字？”女儿回答：“我们语文书上有他写的关于长城的文章。”可见罗老的学术工作与社会各界的关系之紧密。我想，如果我们从事遗产保护工作都能像罗老那样使之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众所周知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早日迎来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保护遗产就是要“打鱼不晒网”

赵中枢

国科学院阳含熙先生也共同签名，这一提案被大会通过，并被称为《第663号提案》。1985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这一件大事好多报刊书籍都有记述。关于推进这件事情的过程，侯仁之先生、罗哲文先生和郑孝燮先生都跟我谈过。罗老和郑老十分谦逊，2011年侯仁之先生百岁华诞之前，他们还写了《侯老带领我们提交〈第663号提案〉》一文。事实上，这项提案的推进难度很大。牵涉到的一个难题是由哪个部门负责此项工作。因为“世界遗产公约”是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通过的，按照对应的原则，我国应当将本国的相应机构设在教育部，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对自然和文化遗产在专业上当时不是很熟悉。阳含熙先生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自然遗产方面；罗老代表国家文物局，郑老代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代表文化遗产方面，他们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影响，对遗产的重要性和我国加入公约的必要性，做了大量的宣传介绍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的进展。另一个难题是加入公约约要交会费，当时大家都知道要交的是昂贵的外汇。按照侯先生提案的介绍，“公约约交费为教科文委员

国会费的百分之一，为数不多”，但实际上还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罗哲文先生是长城专家，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人”，在我国成为世界遗产缔约国之后，为申报遗产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截至2012年3月底，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1项，其中文化遗产29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又称双遗产)4项，遗产总数居世界第三位，遗产保护事业逐步走向正轨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提案我国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这四位功勋。

侯先生年事已高，罗老、郑老经常关心问候，我去看望侯先生时，也常常讲罗老、郑老的近况及有关名城、文物保护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无私的屡战屡败又满怀希望百折不挠的悲壮情结。罗老突然仙逝，我不敢将这个噩耗告知侯先生，他的女儿以侯仁之先生名义撰写挽联缅怀罗老：携手提案世界遗产君功德，终生保护文物古迹知难行。

保护遗产就是要“打鱼不晒网”

罗老16岁起(1940年)追随梁思成先生从事古建筑保护，是我国营造学社的最后一位见证人。70多年来，罗老一直在为遗产保护而呼吁、呐喊、著述、实践。他

是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涉及遗产保护的领域十分广泛，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线型文化遗产如万里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都是他关注的对象。罗老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倡导者之一。1982年我国公布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5月3日至7日，全国24座名城领导和专家聚会扬州，商讨新时期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问题。罗老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新发展》为题目做了大会发言。罗老将我国文物、古建筑、古城镇保护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次将古建筑列入文物保护的范畴。第二阶段是古建筑保护的重要发展阶段即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与公布。第三阶段，就是这次由经济学界为主倡导发起的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生讨论，这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包括文物古建筑、文化传统)保护、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发展。

罗老讲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是历史文化名城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也就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了。罗老特别指

出，历史文化名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有基础的，其发展是有条件的。作为名城发展基础的历史遗产、文化宝藏，不能破坏，在进行新的建设与发展时，要慎之又慎。也就是必须在保护原来的文物古迹、文化传统、城市规划的格局、城市建筑的风貌、风景名胜等前提下去做发展。

罗老认为历史文化名城首先是一座城市，它具有城市的一切功能，不是博物馆，不能按照“博物馆”方式保护名城。“社会在前进，经济在发展，居民的生活要改善，这是不能阻止的历史潮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度”的把握，是一个长期的、不能回避的难题。

事实上，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罗老也一直在扮演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救火队员”的角色。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会议呼吁、实地调查解决难题上。在一次文化遗产考察途中，几位耄耋之年的名城保护前辈聊起自己身体状况与遗产考察工作，一位说他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打鱼指出考察、晒网指出考察后稍作调整)，另一位说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罗老说自己是“光打鱼不晒网”。罗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